黔中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

罗 兰，魏 媛

（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贵阳 550025）

摘要：以黔中城市群为研究范围，运用空间分析与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全国和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表明：黔中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整体呈集聚且不均衡分布，其中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形成“单核集聚”态势，方向上沿东西向交通干线延伸，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呈现“多点联动”的格局且沿西北-东南向自然地理脉络分布；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的主导因素为第三产业占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和距公路距离，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形成依赖于资源、经济与区位条件的协同效应。

关键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格局；驱动因素；黔中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13－0155－10

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域空间内，以农业生产生活活动、乡村风光与文化等为主要资源，主要为居民提供观光、娱乐、游览、度假、康养等多种体验的旅游形式[1]，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旅游正逐步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推动资源双向流动与优化配置的重要桥梁[2]。发展乡村旅游不仅能为农村地区带来直接的经济收入，也有助于激发地方文化的创新活力与传承保护，并促进生态环境的修复与可持续管理[3]。而在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中，乡村旅游重点村发挥着显著的典范引领和带动作用，对于整体提升乡村旅游发展品质、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4-5]。因此，深入探究其空间分布结构特征，并分析其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尤为重要[6]。

随着乡村旅游话题被不断关注，近年来关于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研究逐步成为热点之一。从研究方法和内容上看，现有研究聚焦空间格局[7]、影响机制等[8-10]，多采用核密度分析等方法[11-14]，区域上以全国[15]、省域[2]、流域[1]为主，尤其是经济较发达的区域[16]。但城市群及西部欠发达区域的研究仍较为薄弱，黔中城市群作为西部典型，其相关研究亟待开展。此外，现有研究对“单核集聚”“多点联动”等空间现象的解读多停留在实证描述层面，尚未充分结合区域发展理论进行深入阐释。而增长极理论、点-轴系统理论及网络化理论为理解上述格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增长极理论可用于解释优势资源如何向少数核心区域集聚、形成“单核”结构并带动周边发展的过程[17]；点-轴系统理论可揭示发展如何首先集中于少数增长中心，随后沿交通干线等发展轴向外扩散的演化路径[18]；网络化理论则强调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多个发展节点之间通过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形成协同发展格局[19-21]。将上述理论引入乡村旅游空间格局研究，有助于将现象描述提升至机理阐释层面，深化对空间分异规律的理解。

城市群作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其空间结构与资源配置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2017 年发布的《黔中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黔中城市群是贵州省经济活动最为集中的核心区域，也是中国西部地区迅速成长的经济板块，这一发展态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化旅游、大数据与大健康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2022 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培育壮大黔中城市群，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着力打造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22]。而乡村旅游以其产业融合度高、就业带动力强等特点，成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23]。基于此，以黔中城

收稿日期：2026-02-04

作者简介：罗兰（2001—），女，贵州麻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规划；通信作者魏媛（1976—），女，贵州毕节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与农村发展。

市群为研究范围，运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方法分析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构建自然环境-交通区位-社会经济-旅游资源的综合评价体系，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的驱动因素，并借助增长极、点-轴系统及网络化等区域发展理论对空间格局的形成机理进行深入阐释。以期为优化黔中城市群乡村旅游布局、推进区域乡村振兴与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样本

黔中城市群地处贵州省中部，涵盖贵阳、遵义、安顺、毕节、黔东南州、黔南州 6 个市（州）以及贵安新区，共包含 33 个县（市、区），总面积约 5.38 万 km^2（图 1），作为贵州省发展经济实力最为突出的区域，黔中城市群是引领全省经济持续增长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24]。在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加快建设以及贵州省“强省会”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其发展目标是到 2030 年建设成为具有山地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先行区以及生态环境优良的宜居城市群[25]。

截至 2024 年 8 月，黔中城市群已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22 个，其中第一批 7 个，第二批 9 个，第三批 4 个，第四批 2 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159 个，其中第一批 17 个，第二批 36 个，第三批 23 个，第四批 27 个，第五批 32 个，第六批 24 个。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对象包括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其中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来源于文化和旅游部官网，贵州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来源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利用有关网站、高德地图等方式获取研究对象的详细信息，再利用 ArcGIS 工具统一转换为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坡度、河流、平均气温、公路、地区生产总值、人口密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中心；第三产业占比来源于贵州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4A 级及以上景区数量和传统村落数据来源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所有的数据均选取 2019—2024 年度的平均值。

1.3 研究方法

1.3.1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能够用于衡量某一地理要素分布集中化程度，可以分析黔中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的差异特征[2]，计算公式为

$$G = 100\sqrt{\sum_{i=1}^{n}\frac{X_i}{Y}\frac{X_i}{Y}} \tag{1}$$

$$G_0 = 100/\sqrt{n} \tag{2}$$

式中：G 为地理集中指数；X_i 为第 i 个市的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Y 为黔中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总数；n 为黔中城市群州市的总数量；G_0 为乡村旅游重点村平均分布在黔中城市群各地级市时的地理集中指数，当 $G > G_0$ 时，表明乡村旅游重点村呈现出集中分布的态势，反之则相对分散。

1.3.2 不平衡指数

不平衡指数可以用于衡量研究对象在不同区域范围内的空间分布是否均衡，能够有效评估乡村旅游重点村在黔中城市群中的布局平衡性[26]，计算公式为

$$S = 100n - 50(n+1)\left[\sum_{i=1}^{n}Y_i - 50(n+1)\right] \tag{3}$$

式中：S 为不平衡指数；Y_i 为将各市级行政区划内的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占总数的比例，按照从高到低排序后，第 i 个市级区划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累计百分比总和。S 介于 0～1，当 $S=0$ 时，表明研究对象在黔中城市群呈现均匀的状态，而当 $S=1$ 时，意味着研究对象高度集中。

1.3.3 核密度分析法

核密度分析用于计算要素在其周围邻域中的密度[27]，可以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特征进行可视化表达，计算公式为

$$f = \frac{1}{nh}\sum_{i=1}^{n}k\left(\frac{x-x_i}{h}\right) \tag{4}$$

式中：$k()$ 为核函数；f 为核密度估算值；h 为带宽参数，用于控制光滑的程度；x 和 x_i 为空间样本点，$x-x_i$ 表示点 x 到点 x_i 处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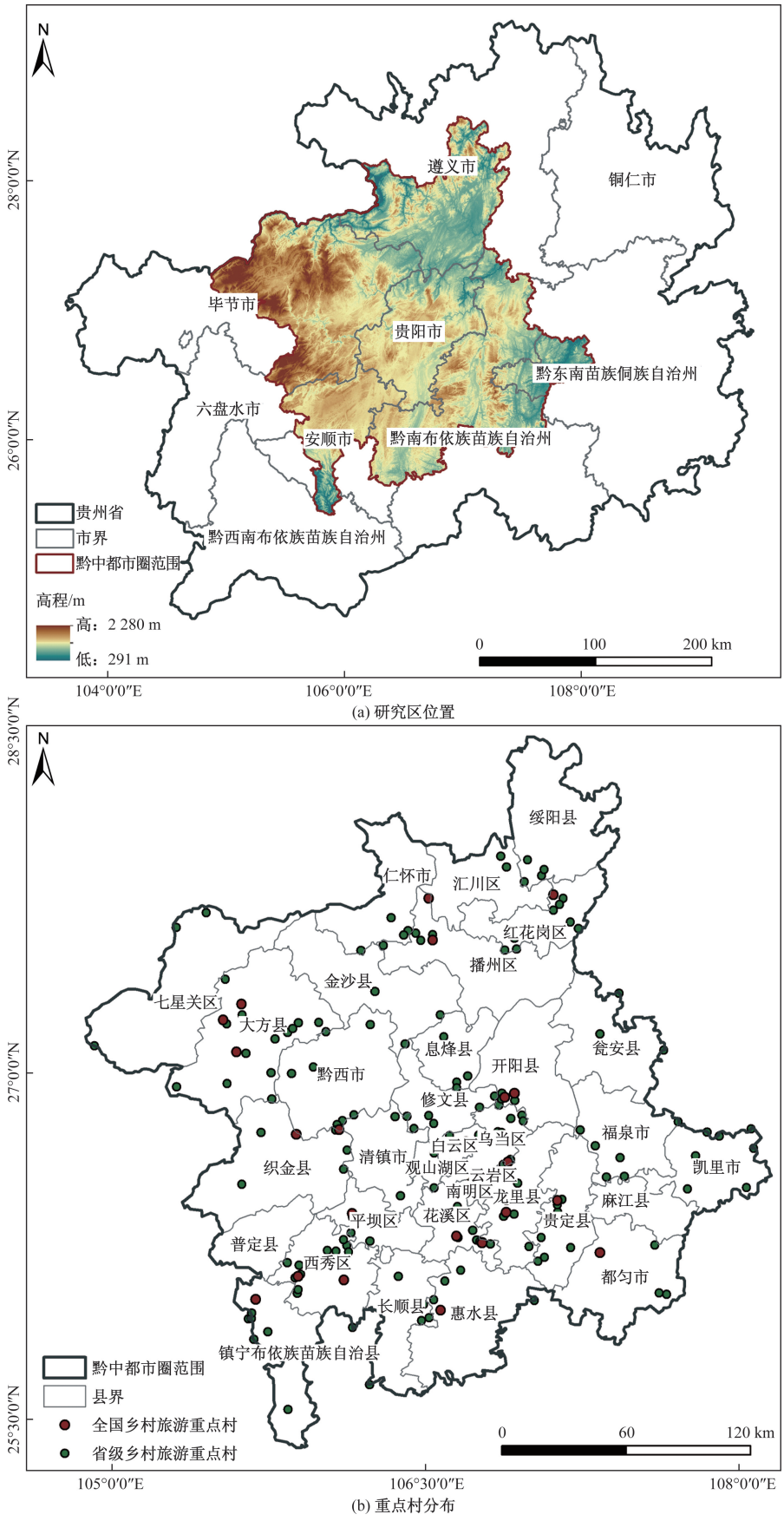
1.3.4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可以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包括中心趋势、离散和方向趋势，能从质心、方向和形状等方面揭示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的大致方向、范围以及扩散趋势[28]，计算原理如下。

（1）计算标准差椭圆的中心坐标（X_w，Y_w）。

$$(\overline{X}_w,\overline{Y}_w) = \left(\frac{\sum_{i=1}^{n}w_i x_i}{\sum_{i=1}^{n}w_i},\frac{\sum_{i=1}^{n}w_i y_i}{\sum_{i=1}^{n}w_i}\right) \tag{5}$$

式中：w_i 为 i 点的权重；(x_i,y_i) 为研究要素的空间区位；$(\overline{X}_w,\overline{Y}_w)$ 为加权平均中心。



审图号:GS(2024)0650 号

图 1　研究区位内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

(2)计算方位角函数 tanθ。

$$\tan\theta=\left[\left(\sum_{i=1}^{n}w_i^2\,\tilde{x}_i^2-\sum_{i=1}^{n}w_i^2\,\tilde{y}_i^2\right)+\sqrt{\left(\sum_{i=1}^{n}w_i^2\,\tilde{x}_i^2-\sum_{i=1}^{n}w_i^2\,\tilde{y}_i^2\right)^2+4\sum_{i=1}^{n}w_i^2\,\tilde{x}_i^2\,\tilde{y}_i^2}\right]\Big/2\sum_{i=1}^{n}w_i^2\,\tilde{x}_i\,\tilde{y}_i \tag{6}$$

式中：θ 为标准差椭圆的方位角；$\tilde{x}_i$、$\tilde{y}_i$ 为各点相对于加权平均中心的坐标离差，即 $\tilde{x}_i=x_i-X_w$，$\tilde{y}_i=y_i-Y_w$。

(3)计算 x 轴和 y 轴的标准差 ∂_x、∂_y。

$$\begin{cases}\partial_x=\sqrt{\dfrac{\sum_{i=1}^{n}(w_i\,\tilde{x}_i\cos\theta-w_i\,\tilde{y}_i\sin\theta)^2}{\sum_{i=1}^{n}w_i^2}}\\ \partial_y=\sqrt{\dfrac{\sum_{i=1}^{n}(w_i\,\tilde{x}_i\sin\theta-w_i\,\tilde{y}_i\cos\theta)^2}{\sum_{i=1}^{n}w_i^2}}\end{cases} \tag{7}$$

1.3.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作为一种空间数据分析的统计模型，能够分析地理要素的空间异质性，也可以探测两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主要运用其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两个版块[29]。

(1)因子探测：用于检测各影响因子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解释度(Q)，计算公式为

$$Q=1-\frac{\sum_{m=1}^{L}N_m\sigma_m^2}{N\sigma^2} \tag{8}$$

式中：Q 的取值范围为[0,1]，Q 值越大，表示驱动因子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解释度越强；N_m 和 N 分别为区域 m 和研究区的单元数；m 为分类或分区数量；σ_m^2 和 σ^2 为区域 m 因变量和研究区整体的方差。

(2)交互探测：能够评估不同因子 X 之间是否对因变量 Y 存在交互作用，即两个因变量共同作用时是否会增加或减少对因变量的解释力，或者是否相互独立。交互作用类型包括双因子增强、非线性增强、独立、单因子非线性减弱、非线性减弱 5 类(表 1)。

2　结果与分析

2.1　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格局特征

2.1.1　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集聚特征

运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研究黔中城市群各个市级行政区范围的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均衡性。通过地理集中指数公式计算得出黔中城市群地理集中指数 $G=43.93$，理论平均分布地理集中指数 $G_0=40.82$，$G>G_0$，表明黔中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呈现较为集中的态势；通过不平衡指数公式计算出黔中城市群各市的不平衡指数 S 为 0.26，这一结果表明乡村旅游重点村在黔中城市群各市的分布呈现出较为不均衡的状态，不同区域间的资源分配差异较大。

表 1　地理探测器交互作用类型

判断依据	交互作用类型
$q(X_1\cap X_2)<\min[q(X_1),q(X_2)]$	非线性减弱
$\min[q(X_1),q(X_2)]<q(X_1\cap X_2)<\max[q(X_1),q(X_2)]$	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q(X_1\cap X_2)>\max[q(X_1),q(X_2)]$	双因子增强
$q(X_1\cap X_2)=q(X_1)+q(X_2)$	独立
$q(X_1\cap X_2)>q(X_1)+q(X_2)$	非线性增强

2.1.2　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格局特征

1)空间分布密度

分别对全国、省级以及合并后的乡村旅游重点村进行核密度分析，如图 2 所示。结果表明，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相对分散，形成了多个高中等密度的聚集点，呈现“多点联动”的空间分布格局，最高值出现在贵阳与黔南州交界的龙里县、花溪区以及毕节市中部的大方县。这表明，国家级重点村的评选可能更注重资源品质的代表性、类型的多样性以及区域平衡性，旨在让国家级品牌效益能辐射到更广的范围。因此，它们并未在空间上过度集中于单一核心，而是形成了多个具有一定带动能力的次级中心。这种多点布局的方式契合网络化发展与协同发展的逻辑，多个高品质资源点依托自身禀赋形成次级中心，通过功能互补和客源共享，可以构建起一个联动发展的乡村旅游网络，从而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减。

与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相反，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单核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分布在贵阳市的乌当区和开阳县，在安顺市的西秀区和贵阳市花溪区南部出现次级核心。这种由核心向次级核心蔓延的态势，与增长极理论描述的极化-扩散过程相吻合。贵阳市作为黔中城市群的核心增长极，其较强的经济辐射能力、较高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枢纽性的交通地位，对乡村旅游要素产生了明显的吸附作用，使得乌当区、开阳县等地成为资源集聚的核心区，体现了市场经济和政策引导下资源向优势区位集中的规律。与此同时，安顺西秀区等次级核心的出现，也初步显现了增长极效应开始向外围扩散的迹象。这说明省级层面的资源培育和政策扶持具有更强的重点导向性，集中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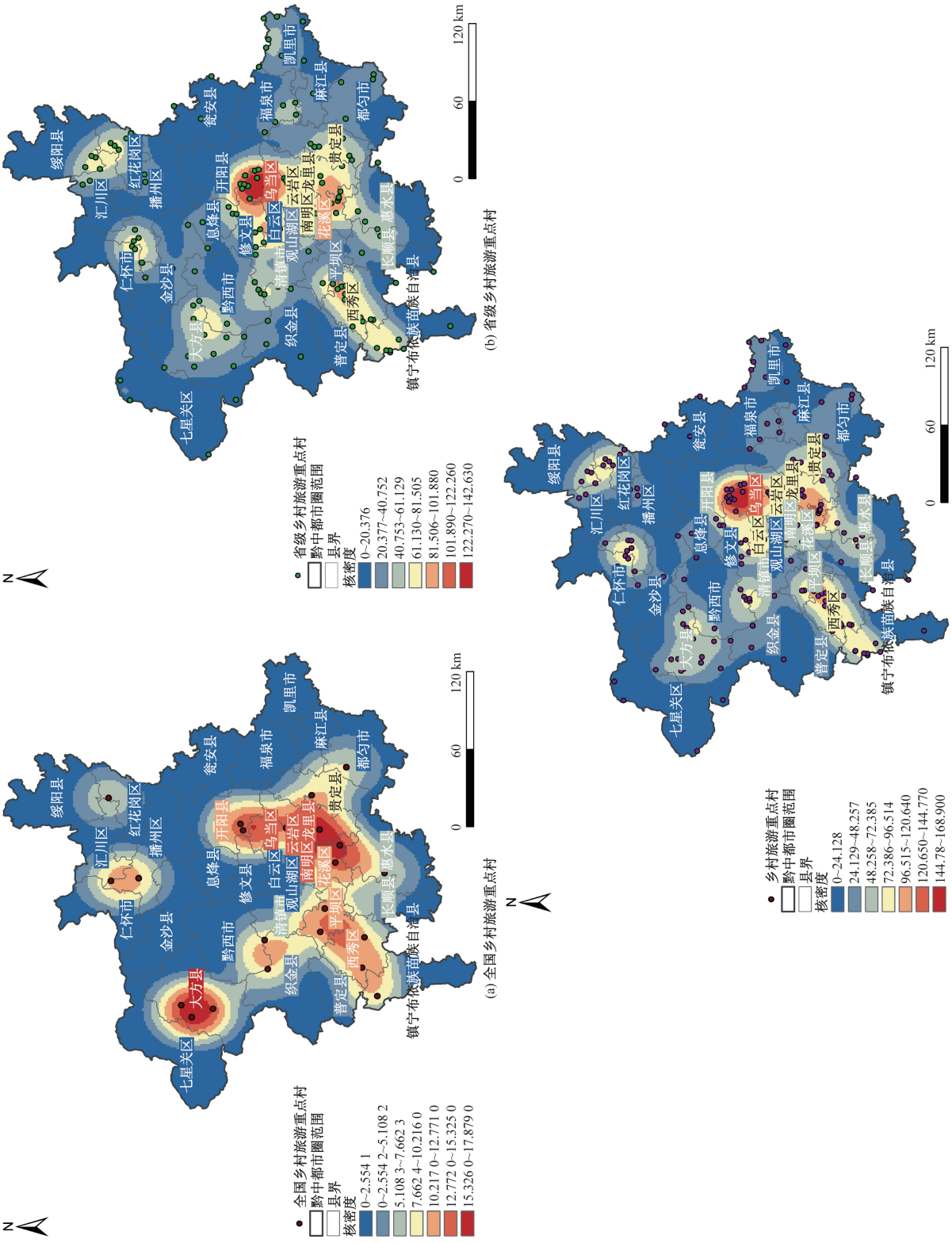


图 2　黔中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核密度分析图

量优先发展基础最好、潜力最大的核心区域。

总体上看，黔中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既有省级重点村高度集聚的“核心”特征又融入了全国重点村“多点”分布的格局，整体上呈现出由高密度核心区（乌当区、开阳县）向外围中等密度区扩散的“点轴”过渡态势。这种以贵阳周边为核心、沿东西向交通干线向外延伸的空间演进，正是点-轴系统理论的典型体现，即以贵阳市相关区域为高能级增长点，依托东西向主要交通干线这一发展轴进行要素扩散和产业延伸，进而带动安顺西秀区等轴线周边区域发展。交通干线在此扮演了“发展轴”的关键角色，成为引导乡村旅游空间拓展的重要通道。这一格局表明，黔中城市群的乡村旅游发展并非简单的均质化分布，而是一个由强力核心、多个节点以及连接它们的潜在发展廊道所构成的体系，为未来构建分工协作、有机联动的全域旅游网络奠定了空间基础。

2）空间分布方向

进一步运用标准差椭圆来分析黔中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方向，标准差椭圆的分布如表 2 和图 3 所示。由结果可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表现出鲜明的西北-东南走向，其椭圆相对紧凑，重心偏西南，表明国家级品牌的布局更深地受制于区域核心旅游资源（如山脉走向、河谷分布）的本底条件，倾向于在自然与文化资源禀赋最为优越和集中的廊道上集聚。相比之下，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则呈现出东西向的空间格局，分布范围更广，重心整体向东北方向偏移，这种方向性与贵州省东西向交通大动脉的走向高度吻合，反映了省级层面的规划更侧重于交通可达性、市场辐射范围以及区域均衡发展，通过沿主要发展轴线布局，形成高效的旅游网络。而从总体上看，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特征与省级高度相似，表明在整体格局中，数量上占优势的省级重点村起到了主导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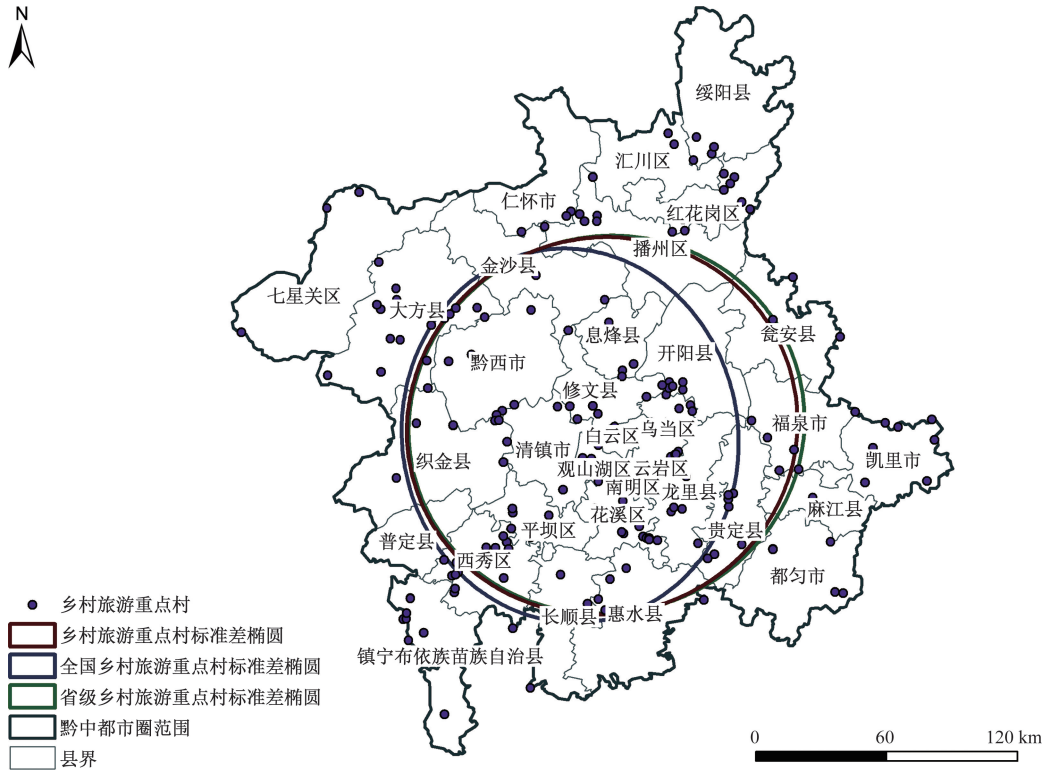
2.2　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2.2.1　影响因子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总结已有成果[9,11]，同时考虑到指标的科学性、可获取性及与研究区域高度相关的原则，从自

表 2　标准差椭圆参数

类型	重心坐标 X	重心坐标 Y	X 轴距离/km	Y 轴距离/km	方向角/(°)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06.434 36	26.739 34	155.64	168.82	123.93
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106.604 29	26.782 27	181.26	171.85	85.03
乡村旅游重点村	106.583 63	26.777 05	178.86	171.71	85.35



审图号：GS(2024)0650 号

图 3　黔中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方向

然环境、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及旅游资源4大维度构建指标,遴选出13个影响因子来揭示影响黔中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格局的驱动因素(表3)。

自然环境是本底性制约因素。选取高程、坡度作为基本地形指标,直接制约村镇的选址、基础设施建设的难易度以及旅游活动的类型;与水系距离反映了村落亲水景观的潜力与生态条件,年平均气温则是影响旅游舒适度与旺季长度的重要气候因子。

交通区位是发展的关键外部条件。距公路距离和距区县中心距离分别衡量了村落的外部交通可达性和与主要客源市场的接近程度;公路密度则表征了村落内部的道路连通性,直接影响游客的游览体验和区域的整合度。

社会经济水平是发展的支撑与潜力所在。地区生产总值反映了区县层面的整体经济实力,是旅游投资的宏观基础;人口密度既暗示了本地市场需求规模,也与劳动力资源的可获得性相关;第三产业占比是衡量区域经济结构现代化程度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更能为旅游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旅游资源是吸引游客的核心竞争力。4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代表了区域内核心动力的旅游吸引力,能产生显著的"辐射效应"或"集聚效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和传统村落密度则深度刻画了贵州作为多民族省份所独具的文化资源禀赋。

表3　影响因子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因子解释
自然环境	高程 X_1	影响地形起伏与景观视野
	坡度 X_2	制约建设难度与活动类型
	与水系距离 X_3	表征亲水性与生态景观资源的邻近度
	年平均气温 X_4	影响旅游舒适度与适宜季节长短
交通区位	距公路距离 X_5	表征外部交通的可达性
	距区县中心距离 X_6	反映与区域中心市场的距离
	公路密度 X_7	衡量内部路网连通性与便利程度
社会经济	地区生产总值 X_8	反映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密度 X_9	表征本地市场潜力与劳动力供给
	第三产业占比 X_{10}	衡量区域经济结构转型与服务业基础
旅游资源	4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 X_{11}	反映高级别旅游核心吸引力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X_{12}	表征文化资源的等级与独特性
	传统村落密度 X_{13}	反映传统文化载体空间的集聚程度

2.2.2　影响因子探测结果分析

1)单因子探测

单因子探测结果见表4,所有指标均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但其影响程度(q值)存在显著差异。各因子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第三产业占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距公路距离>公路密度>地区生产总值>传统村落密度>高程>与水系距离>人口密度>4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距区县中心距离>年平均气温>坡度。其中,第三产业占比($q=0.237$)的解释力最强,这一结果表明区域整体经济结构,特别是服务业(旅游业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水平,是决定乡村旅游能否实现高品质、规模化发展的关键基础。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地区,意味着其基础设施、服务意识、消费市场都更为成熟,能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培育提供优越的条件。同时,地区生产总值($q=0.136$)也表现出较强影响力,印证了区域整体经济水平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q=0.198$)和距公路距离($q=0.193$)的q值均接近0.2,影响力显著,这说明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构成乡村旅游核心吸引力的"灵魂",便捷的交通可达性是乡村旅游吸引游客的"生命线",二者分别从"吸引力"和"可进入性"两个维度,共同奠定了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的基础格局。高程($q=0.129$)、与水系距离($q=0.125$)以及传统村落密度($q=0.131$)均表现出中等的影响力,这表明,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分布上倾向于选择地势相对平缓、亲水景观良好且传统文化资源富集的区域,体现了乡村旅游发展对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资源禀赋的基础性依赖。然而部分因子的影响力则相对有限,坡度($q=0.018$)和距区

表4　单因子探测结果

影响因子	q	P
高程 X_1	0.129	0.000
坡度 X_2	0.018	0.000
与水系距离 X_3	0.125	0.000
年平均气温 X_4	0.042	0.000
距公路距离 X_5	0.193	0.000
距区县中心距离 X_6	0.052	0.000
公路密度 X_7	0.137	0.000
地区生产总值 X_8	0.136	0.000
人口密度 X_9	0.122	0.000
第三产业占比 X_{10}	0.237	0.000
4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 X_{11}	0.086	0.00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X_{12}	0.198	0.000
传统村落密度 X_{13}	0.131	0.000

县中心距离($q=0.052$)的 q 值较低，暗示在黔中城市群尺度下，地形起伏的微观制约效应不突出，且乡村旅游对远离区县中心的偏远地带仍有一定适应性。

2)交互因子探测

交互因子探测结果如图 4 所示，任意两个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力(q 值)均大于任一因子的独立解释力，不存在相互独立或线性减弱的关系。其中，以第三产业占比、地区生产总值等社会经济因子与 4A 级及以上景区数量等旅游资源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最强。这一规律表明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形成并非依赖单一优势，而是社会经济条件、核心旅游资源、区位与市场多重优势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优越的自然文化资源必须与良好的交通可达性和服务产业基础相结合，才能最大程度地转化为乡村旅游发展优势。因此，乡村旅游的规划与发展应具备系统性思维，着力推动不同优势条件的聚合与协同，而非孤立建设。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乡村旅游重点村整体呈集聚且不均衡分布。其中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形成高度集聚的核心，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则呈现相对分散的“多点联动”格局，二者共同构成点轴扩散的总体格局。

(2)全国与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分布方向上存在显著差异。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顺应西北-东南自然地理脉络，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则呈现鲜明的东西走向，与区域交通干线和发展轴带高度吻合。

(3)从驱动因素上看，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是各因子非线性协同驱动的结果。地理探测器验证，第三产业占比、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是核心驱动力，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均强于单因子作用，揭示了“资源-区位-经济”协同的内在逻辑。这种协同效应源于因子的阈值突破与交互耦合，是决定乡村旅游空间分异格局的关键机制。

3.2　讨论

3.2.1　空间格局与驱动机制：不同尺度下的生产逻辑与非线性协同

国家级与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格局分异，反映了不同尺度下区域发展逻辑的差异。省级“单核集聚”格局更多遵循增长极理论的逻辑，在资源有限条件下通过极化效应将要素优先配置于基础最好的核心区域，以快速形成规模效应和示范标杆。这种集聚模式将资源集中于交通最便利、市场最接近的核心区域，旨在通过规模效应提升整体竞争力。而国家级“多点联动”格局，不仅是资源导向的结果，更体现了对资源品质代表性、类型多样性及区域辐射效应的综合考量，通过相对均衡的空间布局力求在区域协同与整体效益之间寻求平衡。这种格局体现了网络化理论与点-轴系统理论的核心逻辑——在承认多个重要资源节点的基础上，依托自然地理廊道或有形交通轴线，通过政策引导实现功能互补与客源共享，构建一个更加均衡、有机联动的区域发展系统。两种模式并非对立，而是揭示了乡村旅游从“重点培育”向“网络协同”演进的不同阶段，也反映出政策侧重点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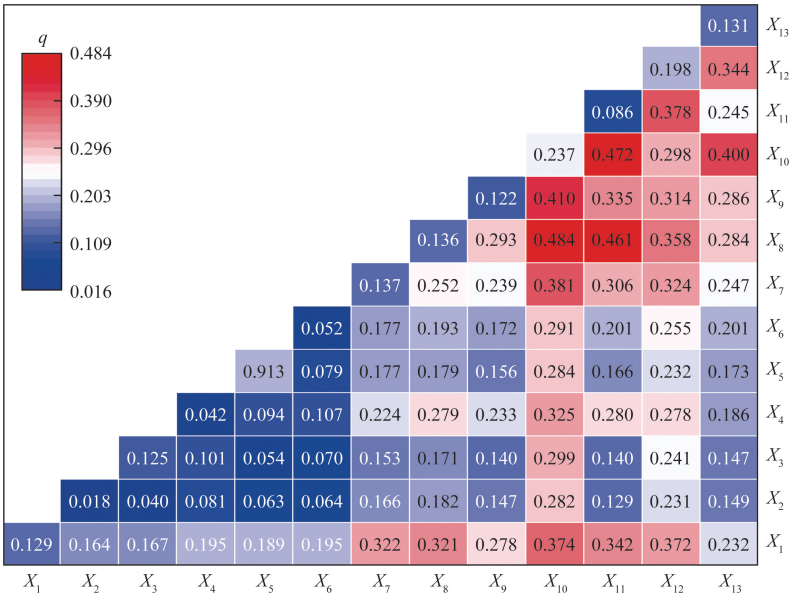


图 4　乡村旅游重点村交互因子探测结果

无论是“多点联动”还是“单核集聚”，都揭示了乡村旅游发展的非线性协同机制。地理探测结果表明，乡村旅游的成功并非依赖若干“优势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取决于这些要素之间能否形成有机融合与正向互动。这种非线性关系主要源于两个方面。①部分驱动因子存在阈值效应。距公路距离只有突破某一临界点，其促进作用才会显著释放；第三产业占比也需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为乡村旅游提供足够的专业人才与市场配套，推动其从“农家乐”向“乡村度假”跃升。②因子之间存在交互耦合关系。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第三产业占比为例，独特的文化资源需要完善的服务业基础才能实现价值转化，二者结合产生的效应远大于各自独立贡献之和。便捷的交通能扩大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辐射范围，发达的经济又能支撑更完善的交通网络建设，二者相互促进。即便某村同时具备优质资源、便捷交通和一定经济基础，若要素之间缺乏协同，其发展仍可能陷入瓶颈，如交通改善未能有效转化为游客消费、景区吸引力未能辐射周边，则难以形成持续增长动力。这表明，乡村旅游的核心驱动力并非静态的要素禀赋，而是要素之间能否形成正向耦合与协同增效，这种非线性协同机制正是理解区域格局差异、实现乡村旅游效益最大化的关键所在。

3.2.2　规划启示：基于空间分异规律的差异化施策

基于上述格局分异与驱动机制的分析，本文的结果能够为制定精准化的乡村旅游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对于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集中的西北-东南廊道，其“多点联动”格局要求政策应侧重于“提质增效”，强化其品牌引领作用，重点支持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高品质业态融合，通过促进节点间的功能互补与客源共享，进一步释放其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效应；对于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高度集聚的东西向廊道，这一格局沿交通干线延伸的特征明显，应进一步完善交通网络与基础设施，推动沿线村落的功能互补与客源共享，构建成熟的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同时注重发挥核心区域的扩散效应，带动边缘区域发展；对于分布较为稀疏的区域，则应挖掘其潜在特色资源，通过改善局部交通条件，将其主动嵌入区域旅游网络。这种基于空间规律的分区分类指导，是实现黔中城市群乡村旅游从局部繁荣到全面振兴的关键。

3.2.3　研究局限与展望

尽管研究了黔中城市群内全国和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及驱动因素，但未纳入社交媒体等新兴驱动力，且侧重静态分析，未来可引入多源数据、分析批次演化。①影响因素指标的选取虽具代表性，但未能完全捕捉如社交媒体关注度等新兴驱动力，未来可引入多源大数据（如 POI、社交媒体签到数据）以更动态地刻画市场需求；②研究侧重于静态格局分析，未来可对不同批次乡村旅游重点村数据进行空间演化分析，从而更清晰地揭示其动态演变规律。

参考文献

[1] 崔红茶，陈新，王涛，等. 长江流域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J]. 生态经济，2024，40(6)：126-134.

[2] 文平，袁志雨，陈宁，等.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5，47(7)：104-114.

[3] SIN A，NOWAK C，BOGUSZ M，et al. Innovations in rural tourism in Poland and Romania[J]. Ekonomika Poljoprivrede，2020，67(2)：623-633.

[4] 王佳莹，张辉. 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逻辑与战略路径[J]. 旅游学刊，2024，39(12)：17-28.

[5] 刘丽梅，习瑞，李帅威.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及区位优势度分析：以甘肃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2024，31(12)：26-33.

[6] 梅佳琪，王晓伟，贺伟祺. 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科技和产业，2025，25(12)：168-173.

[7] 宋小龙，马明德，李陇堂，等. 宁夏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分析[J]. 干旱区地理，2024，47(11)：1957-1969.

[8] CAO X L，CAO Y.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a case study of Beijing[J]. Journal of Landscape Research，2025，17(3)：33-39.

[9] 侯建楠，胡静，李宗琪，等. 新疆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机理[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5，59(6)：967-979.

[10] 王慧娴，杨蓓，陈思静，等. 基于网络关注度的黄河流域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4，45(7)：221-235.

[11] 孙雪瑶，易能，陈广宇，等. 江苏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类型、空间分布及影响因子[J]. 江苏农业科学，2024，52(17)：277-290.

[12] 杨翠霞，杨颜冰，刘晖. 基于 ArcGIS 的辽宁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大连工业大学学报，2024，43(2)：136-140.

[13] 孙卿，高楠，田祥宇. 山西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问题，2024(3)：106-112.

[14] 孙园园，王颖. 东北三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农业与技术，2023，43(15)：141-145.
[15] 刘宇杰，周勇，刘小东，等.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56(1)：211-220.
[16] 王婷婷，杨霞，刘守江，等.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5，46(6)：649-657.
[17] 王心蕊，黄丹丹，李毓. 廊道旅游地空间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制[J]. 经济地理，2025，45(1)：1-12.
[18] 史正山，黄成林. 凤阳县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探讨[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6)：24-29.
[19] 汪威，李玺. IRT 理论视角下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我国 56 个村落的洞察[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5，39(7)：176-185.
[20] 张彪，付水宝，许春燕，等. 政策网络理论视角下乡村旅游协同治理高质量发展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25，36(7)：113-116.
[21]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全域农文旅融合发展理论与模式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
[22] 田俊，李旭东. 西部山地城市群城乡融合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以黔中城市群为例[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6，44(2)：95-106.
[23] 臧昊，梁亚荣.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点状供地的实践困境及破解之道[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8(4)：63-73.
[24] 李胡跃，戴全厚，胡泽银，等. 黔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及预测[J]. 水土保持研究，2024，31(4)：248-257.
[25] 张文彬，周旭，袁稳玲，等. 基于生态韧性的黔中城市群生态区划[J]. 环境科学，2025，46(9)：5883-5894.
[26] 夏敏，张晓瑞，张苗苗. 丽水市传统村落空间布局及影响因素研究[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6(4)：136-144.
[27] 陈郁青. 福建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19，26(12)：12-18.
[28] 刘正兵，张威. 我国乡村老年友好型社区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J]. 小城镇建设，2025，43(10)：47-54.
[29] 王劲峰，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 地理学报，2017，72(1)：116-134.

Study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in Central Guizhou Urban Agglomeration

LUO Lan，WEI Yuan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The Central Guizhou Urban Agglomeration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scope. Spatial analysis and the Geodetector method were adopted to explor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It is found that the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in the Central Guizhou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by agglomerated and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Specifically，provincial key villages present a “single-core agglomeration” pattern，extending along east-west traffic arteries，while national key villages form a “multi-point linkage” pattern distributed along the northwest-southeast natural geographical context. The domin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istribution of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include the proportion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the number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and the distance to highways. The formation of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relies on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resource，economic，and locational conditions.

Keywords：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spatial pattern；driving factors；Central Guizhou Urban Agglomeration